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804016

基于符号理论的建国后汉字简化研究

丁德惠,孙宝民

(盐城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建国后两次汉字简化改革使以象物象形为源头的汉字抽象程度再度提升,符号化性质更加突出。汉字符号不仅在创建初期显现任意性与约定性之间的特定关系,而任意性与约定性制约简化规则、简化符形,凸现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寻求符号与客观世界的相似性上,汉字简化对已经完善的相似性做出割裂式改革,突破原有相似性陈规,寻求新旧符号的相似性,在旧有认知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认知体系和方式。

关键词:符号理论;汉字简化;任意性;约定性;相似性;认知体系

中图分类号:H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4-0071-04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汉字简化改革是新中国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深刻影响。汉字简化改革引发的争议此起彼伏,焦点在于溯源割裂和文化断裂,有人呼吁恢复繁体字,其研究体现在溯源学、训诂学及文化争议。汉字研究轻视简化字的书写和传播属性,而从符号理论来看汉字简化改革则是从另一角度探讨简化字的图画与符号演化特征及传播特性。

一、图画-符号的汉字创建和演变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是中华民族及以汉语为使用语言的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感情交流、思维交流的重要代码。经过数千年演变,汉字呈现“字形逐步统一整齐、笔画逐步省改简化、书写逐步方便简捷”^{[1]70}的特征和趋势。早期汉字延承结绳记事、图画记事,以描摹自然世界客观事物的形状表达含义,如甲骨文、金文均有明显图画性。秦王朝实行“书同文”改革后,线条化、笔画化、符号化特征在小篆上开始显现,篆书、隶书、楷书、简体字等字体以及草书、行书中线条化、笔画化、符号化特征愈发突出,图画特性显著减弱。汉字的方形特征在汉字改革中缓慢形成,篆书的长方形、隶书的扁方形、楷书的正方形,有利于书写、

阅读和辨认。汉字从图画向符号的革新,提升了书写的速率,提高传播的速度。

自汉以降,虽有多次汉字造字法的论争,但基本形成“多依朱宗莱的主张,从许慎的名称而遵班固的次序”^{[2]37}的共识,许慎认为“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3]。班固以为“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4]。笔者以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符合汉字图画-符号、具象-抽象的进化规律。作为最古老的方法,象形字显现汉字初创期描摹客观事物物象的原始属性,“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3],表明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原始方式。“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3],“用指事性的符号来表现词所概括的无法模拟的客观事物或抽象概念的造字法”^{[2]44},是“独体实物形象(象形字)上加指事符号,或者是纯粹的抽象符号”^{[1]49},指事法使汉字的图画功能逐渐向抽象的符号功能转化。“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3],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意符号结合起来以表现一个新的意义”^{[2]47},可以是实物形象组合,可以是实物形象

收稿日期:2018-08-24

项目基金: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7SJB1556)

作者简介:丁德惠(1976—),江苏东台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传播学、媒介文化。

与抽象符号组合,也可以是抽象符号组合。“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3],由形符和声符构成,形符主要来源于象形字,声符来源于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以及先造的形声字。转注、假借是本字字义或音韵的抽象转换,转注是以“形通、音近、义同”实现一义多词,即“建类一首,同意相受”^[3];假借是用同音的字表示没有的字,即所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3]。从象形到指事到会意再到形声及至转注、假借的演变是汉字从客观事物的图画描摹性向表意符号的进化,是具象功能向抽象功能的转变,创建汉字表形表意表音的符号系统。《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中所列形声字的数量变化同样说明汉字图画功能弱化,符号功能增强。

二、任意性与约定性的二维选择

分析《汉字简化方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等,汉字简化改革在历时层和共时层及符号构件上进行任意性和约定性的博弈。

1. 符号任意性与约定性的二维性。索绪尔认为,表音文字符号是所指和能指即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而“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5]102},意味着文字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系统,“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5]104}生成学派认为语言系统是人类的心智活动的结果,所指、能指的结合及其组合关系具有绝对任意性。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维度,“是建立语言结构系统的首要前提”^[6],反映早期人类心智与自然世界、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偶然性机制。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符号受到集体行为的规约,体现人类社会的契约性,“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5]103}。索绪尔认为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通过一个词“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5]53},未论述汉字的能指、所指及其关联或意指作用。笔者以为汉字初创期任意性和约定性是极其重要的原则,汉字简化运用此规则。

2. 简化规则的任意性与约定性的二难选择。“语言符号因为有任何任意性就给社会的选择提供了机会。”^[7]汉字简化改革是在任意性基础上进行约定性选择,是汉字符号规则的深层推演。1950年8月9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组织简体字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上确定四原则,强调简化字来源于

“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应的补充”,且“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必为每一繁难的汉字制作简体”^{[8]21}。1952年3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确定编制简化字方案四原则,简化字来源于“已有通行简体的字”,“以述而不作、不另造简体字为原则。但无通行简体而笔画较多的常用字不妨另找简体”^{[8]22}。“述而不作”“就是只记录、整理已有的简体字,而不去制造新的简体字。”^{[8]35}这表明汉字存在一个概念多个符号的现象,如“个”在《左传》《礼记》《仪礼》等先秦著作即已出现,而后出现“箇”“個”,从另一种角度显示汉字生成的任意性。1977年12月20日试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则是任意性的人为扩大化,片面追求字形简化、字数减少,在躁动欲求和政治诉求双重刺激下出现肆意妄为的民众简化,雪减为𠂔,眉、𠂔、涓等减为 眉去“目”的字,“一人为寡——𠂔,人小为矮——‘𠂔’”^[9],“僚”“聊”简化为“𠂔”“𠂔”。任意性对汉字符号系统和传播规律形成损伤。

过度的任意性必然限制约定性。1950年汉字简化改革确立“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即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在社会上达成共识,也即“约定俗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体字总表》及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都建立“约定俗成”机制。《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中“不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中“同音代替字”“形声字”“特征字”“轮廓字”及“草书楷化字”“新造会意字”“符号字”“简化偏旁”,很大程度脱离社会现实和历史规律,人为制造新字和新偏旁,破坏符号体系和规律。

3. 符形简化的任意性与约定性。在革新的书写媒介影响下,汉字日渐形成严密的符号体系和构形系统。就象形字而言,古文字的象形字是“直绘物象”,但“它们是为记录语言而设计的字符而不是图画”^{[10]57};而今象形字的直观物象逐渐减少,象物性弱化,尽管能显现文字符号与客观世界的某种物象关系,但要借助抽象符号——笔画辨别,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等莫不如此。

汉字简化是从书写速度出发的笔画简化,或说符形(形符和声符)的简化。第一种是多字或偏旁简化为同一符形,如“單”简化为“单”,作为构件组成“郾、憚、闾、掸、弹”等字,且多作声符;而“戰”字的“單”简化“占”,作声符。但用“占”

作简化的还有“𩇛、𩇛”字的“𩇛”“𩇛”字的“𩇛”。而“𩇛、𩇛、𩇛”等字的“𩇛”“𩇛、𩇛、𩇛”等字的“𩇛”未简化为“𩇛”，符形简化的任意性尤为明显。“二简”中，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如“𩇛”“𩇛”简化为“𩇛”“𩇛”，使用同一符形“𩇛”。多符号简化为一个符号的现象使共时层出现传达困扰，割裂历时层的内涵本义和文化意蕴。第二种是同音或近音的符形简化，如“𩇛”简化成“𩇛”，“𩇛”和“𩇛”分别读“lin”“ling”，是为近音简化；“𩇛”“𩇛”简化为“𩇛”“𩇛”，“𩇛”“了”读“liao”，是为同音简化；“二简”中以音标为纽带的符形简化较普遍，如“𩇛”被用作多个符形的简化，“𩇛”“𩇛”“𩇛”“𩇛”简化为“𩇛”“𩇛”“𩇛”“𩇛”“𩇛”“𩇛”；“𩇛”“𩇛”“𩇛”“𩇛”读“ru”而简化使用“𩇛”偏旁；“同音代替字”则出现多字同音的简化，如“𩇛、𩇛、𩇛、𩇛”简化为一字“𩇛”，“𩇛、𩇛、𩇛、𩇛”简化为一字“𩇛”。简化后笔画减少，书写方便，但含义相差极大，造成辨别困难和传播障碍。汉字简化改革运用符号任意性和约定性进行外科式手术，降低繁复度时破坏汉字的固有体系和规律，在破坏中形成新的共识和体系。

三、类推简化与相似性特征的关联性

“偏旁简化可以类推”^{[8]22}是汉字简化的重要规则和技术方法。类推简化不只是减省笔画、符形，降低汉字识别难度，提升书写速度，也使汉字产生系统性增量、字形结构美感变化^[11]，引发“有限类推”和“无限类推”^[12]争论。

1. 相似性是类推简化的理论基础。汉字是以图画文字为源头的象形文字，是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符号，在符号和客观世界间建立相似性关联，“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13]23}福柯认为相似性有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四种主要形式，适合是邻近位置及属性的相似性，仿效是跨距离复制的相似性，类推是隐蔽的关系相似性，交感是运动的相似性。类推“可以从同一个点拓展到无数的关系”^{[13]29}，汉字创建及篆隶行楷简的演变中类推起着关键作用。建国前汉字有其独立完整的符号系统，建立了以汉字为书写符号、传播符号的相似性世界和认知体系，这种“记号体系逆转了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关系”^{[13]37}，异常稳固。汉字简化对稳固关系进行外科式手术，建立新的抽象系统和符号体系。

2. 类推简化建立新的认知体系。《汉字简化方案》第一表收230个简化字、第二表收285个简化字和第三表收54个简化偏旁，研究者归纳为“保留原字轮廓”“保留原字特征部分，省略一部或大部”^{[8]34}等方法，如“𩇛(𩇛)、𩇛(𩇛)”等保留原字轮廓，“𩇛(𩇛)、𩇛(𩇛)”等保留原字部分特征，原字轮廓或特征维系简化字与原有汉字的相似性，也维持原有汉字与其指称的客观事物的关系。以相似性作为简化准则和技术方法，抽象客观世界、指称事物与字形构造之间的关系。

《简化字总表》依“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14]11}类推“应用第二表所列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14]14}1753个，使汉字简化具有规律性、系统性，形成新的完整的符号体系。维系汉字简化的新认知体系是简化字与原有文字之间的符形相似性，追根溯源是早期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与客观世界指称的相似性。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相似性的简化原则和技术方法。“二简草案”共两表，第一表两个类别收简化字248个，第二表分八个类别收简化字605个。笔者以为“二简草案”最核心的原则是尽最大可能减少汉字笔画，以求提升书写速度，如第二表中简化的6个会意字“矮、集、聚、寡、家、燃”，笔画数分别从13、12、14、14、10、16画简化到5、3、7、3、5、5画。部分“二简字”从古体演化得来，古体字未能广泛使用，其相似性即未被认可。除笔画减省外，“二简草案”最大限度地寻求音标相似性的简化规则，如“敢”简化成“𩇛”“𩇛、𩇛”的“𩇛”简化为“𩇛”是取“𩇛”的韵母“an”，而“𩇛、𩇛”的“𩇛”取其韵母“ao”简化为“𩇛”。

3. 不彻底的类推简化致使认知体系错位。“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即‘能够用来表达任何思想和一切思想的符号系统’”^{[15]48}，文字不止是一种符号，不只是表达某种含义，是人类思想的表达形式。作为现存有限的象形文字汉字有其独特的系统和体系，彰显古人在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寻求适合、仿效、类推及交感的相似性，反映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自然世界的认知关系。但符号是动态的，简化或繁化反映古人对人、对自然世界新的认识。汉字简化中几次类推简化都不够彻底，或者说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四种相似性形式不相为谋，没有形成统一的类推原则和技术方法，造成简化符形呈现差异化。如“𩇛”在“𩇛”的

简化中简化“寸”,作为偏旁简化时则简化为“扌”并类推出扌、𠂇等 11 个简化字。而有些字或符形的简化则显得混乱,如“盧”简化成“卢”和“户”两个符形,分别对应“盧、瀘”等和“蘆、爐、廬、驢”的简化,其中“卢”可作简化偏旁类推,“户”则不可类推。“卢”和“户”的符形非常相似,但在象形文字中完全是不同的内涵及客观世界的对应物。另外,“户”又用于“护(護)”和“沪(滬)”的简化,而偏旁“萑”在“获(獲、穫)”由其他符形替代,“扈”则既保留原有符形也作偏旁。“二简草案”

体现更多的人为性特征,部分二简字造成新的认知障碍。在符形简化上“二简草案”更是突破常规思维,相似性被割裂,类推简化既不完全也不彻底,如“青、卒”的简化和类推,但“靚、猝”等字未类推;而读音相似性的简化更任性,如“疙瘩、圪塔”等简化为“咯嗒”,“薯、蔬”简化为“朶”,虽有某种相似性,却造成系统性、稳定性丧失,新旧符形的相似性也被割断。割裂相似性,重构符号体系,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都无疑是一场“符号学历险”。

参考文献:

- [1] 李梵. 汉字简史[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 [2] 胡晓萍. 汉字的结构和演变[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3]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53.
- [5]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孙炜,严学军. 也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J]. 语文研究,2005(3):17-21.
- [7] 石安石.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J]. 语文研究,1989(4):1-8.
- [8] 张书岩,王铁昆. 简化字溯源[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 [9] 陆锡兴. “二简”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144-150.
- [10] 王宁. 汉字构形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1] 张书岩. 再谈汉字的类推简化[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7.
- [12] 苏培成. “表外字不类推简化”不是国家的政策[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118-119.
- [13] [法]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M]. 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14]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 简化字总表[J].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
- [15] [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M]. 董路,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Study on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Symbol Theory

DING Dehui, SUN Bao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undergone two simplification reforms, increasing the abstraction of the pict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us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ir symbolic n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reveal the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ndomness and agreeability of the symbol, which restricted the simplifying regulation and form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simplification. Therefore, Chinese characters also shows the mode of thinking that human learn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In searching for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ymbols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lso reformed the similarity which had been perfected in the abolishment and establishment, seeking the similarity of the old and new symbols in the abolishment,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original similarity rule, thus establishing the new cognitive system and mode of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on the old cognitive system.

Keywords: symbolic theory;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andomness; agreeability; similarity; cognitive system

(责任编辑:李 军)